



百家讲坛

LECTURE ROOM

系列丛书

中央电视台 CCTV-10

华夏春秋志

百家讲坛

中央电视台《百家讲坛》栏目组 编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

华夏春秋志

百家讲坛

中央电视台《百家讲坛》栏目组 编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华夏春秋志/中央电视台《百家讲坛》栏目组 编

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5

(《百家讲坛》系列丛书)

ISBN 7-300-06247-4

I. 华…

II. 中…

III. 民族文化-中国

IV. 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1703 号

《百家讲坛》系列丛书

华夏春秋志

中央电视台《百家讲坛》栏目组 编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010-62511242 (总编室)

010-62511239 (出版部)

010-82501766 (邮购部)

010-62514148 (门市部)

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

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

网 址 <http://www.crup.com.cn>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×965 毫米 1/16

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张 22.5 插页 2

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247 000
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

总序

2001年7月9日，午间时分，当普通大学的学生们收拾好书包走出课堂的时候，一所特殊的、开放的“大学”悄然开学了。

说其特殊是指——

“海内外名家名师主讲，涵盖科学人文社会内容”是它的办学方针；

“聚集知识精英，共享教育资源，传播现代文化，弘扬科学与人文精神”是它的办学理念；

“学理性与实用性并存，权威性与前卫性并重，追求学术创新，鼓励思想个性，强调雅俗共赏，重视传播互动”是它的追求；

“建构时代常识，享受智慧人生”是它的办学目标。

论其开放是说——

免试免考；

不限年龄、身份；

“热爱知识”是入学的惟一要求。

这是哪所“大学”？

《百家讲坛》。

《百家讲坛》在哪儿？

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。

高度发达的电视技术给了人类一条捷径，让我们能与知识产生如此密切的接触！

杨振宁、李政道、丁肇中、周汝昌、叶嘉莹、白春礼、厉

以宁、冯骥才、龙应台……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在光与影搭建的讲台上传递着人类的精神。这精神是文明繁衍的动力，是人类生存的根基。

让知识可感，让思想可触，让全球的好学之士在光与影的圣殿上与我们感同身受——拥有知识确实是一种幸福。

在一千多个日出日落之后，《百家讲坛》最大的收获是七百多盘沉甸甸的磁带。七百个四十五分钟对于电视节目来说应该算一段不短的时长，特别是当这段时长记录了人类思想精髓的时候。

怎样将人类的这些思想精髓发扬光大呢？

我们想到了出版，这是一种既可供收藏又便于研读的方式。

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，我们精选了五百堂课的内容制成了光盘，分系列结集出版；同时出版近三十本相关的图书，以满足热爱知识的人们不同的求知需求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此“大动作”称为2004年的“壮举”，对于他们的辛苦付出理应深表谢意。

观众和读者朋友，让我们在知识的传承中握手吧！

丛书编委会



目 录

华 夏 春 秋 志

- 夏商周断代工程 彭林 / 1
- 夏文化与夏王朝 邹衡 / 15
- 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 江晓原 / 28
- 汉武盛世的历史透视 孙家洲 / 43
- 汉唐金银器与社会生活 齐东方 / 59
- 敦煌资料与唐朝人的衣食住行 黄正建 / 75
- 漫谈元代藏族的历史与文化 陈庆英 / 92
- 正确看待康雍乾之世(上) 周思源 / 104
- 正确看待康雍乾之世(下) 周思源 / 117
- 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(上) 杨天石 / 131
- 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(下) 杨天石 / 143
- 丝绸之路与丝路考古学 孟凡人 / 153
- 避暑山庄百年史 王思治 / 167
- 中国古代的图腾崇拜 李炳海 / 178
- 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 冯时 / 194
- 中国古代的生产工具与古代文明 白云翔 / 215
- 中国古代体育 崔乐泉 / 238
-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 王世民 / 262
- 中国古代雕塑 钱绍武 / 277
- 中国古代的简牍与石刻 赵超 / 292
- 中国古代兵器 杨泓 / 311
- 解读中国古代都城(上) 刘庆柱 / 323
- 解读中国古代都城(下) 刘庆柱 / 338

夏商周断代工程



主讲人 彭林

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。198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，毕业留校任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，1999年调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思想文化研究所。彭林教授是国家“九五”重大科研攻关项目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专家组专家，他在先秦史、古代礼学、历史文献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，出版了十余部学术专著。

1996年5月16日，新华社向海内外发布了一条消息，国家“九五”重大攻关项目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开始启动。这个消息发布后，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，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启动这么一个工程，它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有多大的意义，它最后的结论究竟如何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工程等等。今天能有机会来给大家就这个项目的情况做一个介绍，我感到很荣幸。

首先我想谈一下这个项目的缘起，怎么想到要组织这么一个工程。在我们中国，我想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，都知道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，这个五千年文明史是怎么算出来的？最早应该从司马迁那里开始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第一篇就叫做《五帝本纪》，司马迁自己曾经说，当时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，学者往往谈我们历史的时候，要谈到五帝，但是就在我们官方的经书里面，有一部叫《尚书》，尚书里面没有谈到五帝，只谈到尧舜，所以很多学者，对于尧舜以前的历史是不相信的，司马迁对这个问题就抱着一个调查研究的态度，到各地去游历，去考察。各地的长老，他们都谈到我们这个地方黄帝曾经呆过，或者炎帝曾经呆过，或者颛顼曾经呆过，那么他调查下来结果呢，“不离古文则近世”，就是跟《大德礼记》记载的那些东西是接近的，尽管有一些东西，现在读起来听起来觉得有些疑问，但是在那样一个大的范围里面，口耳相传确实有这样一段历史，所以司马迁就决定，把五帝时期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开始，写在《史记》的第一篇，他这个说法影响非常之大。实际上，司马迁在写《史记》的时候，里面有一种体裁叫做表，就是年表，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，他完全清楚历史离不开年代，我们的历史是按照年代来记叙

的，司马迁在写年表的时候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，他当时读到许许多多的文献，发现文献里对各个帝王都有年代的记载，比如黄帝在位多少年，炎帝在位多少年，夏来是谁，在位多少年……很遗憾这些记载互相矛盾，司马迁在写这个三代世表的时候，他在前面加了一段话，叫做“余读牒纪”，就是以前帝王的谱系，“黄帝以来皆有年数”，都有纪年，那么读下来的结果，“古文咸不同，乖异”，所以有矛盾，怎么办？司马迁在不能决定哪一说正确，哪一说错误的情况下，只能忍痛地把这一段历史的年代全部舍去，所以他这个年表的第一个叫做三代世表，就是夏、商、西周，这个三代叫做有王无年。开头比如说夏禹，但是夏禹在位多少年没有，他的儿子太康、中康，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年代，他在位多少年没有，一直到少康等等，再下去，整个夏代，整个商代，西周的前半期都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有王无年，王是很清楚的，可惜全没有年代。司马迁把这个年代进行了清理，一直理到什么时候呢，就是西周共和元年，也就是公元前 841 年，从这一年开始，各个诸侯国的纪年，和王室的纪年才完全一致了，所有的诸侯和天子全部有年代了。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很令人尴尬的场面，就是说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，实际上我们可靠的记载，只能追溯到公元前 841 年，也就是说，五千年文明，三千年历史，甚至不到三千年。这个情况，学术界感到是一个极大的遗憾。从西汉末年的刘歆开始，许多学者致力要把这个谜给破解，可以说两千多年来，古今中外的学者，在这个上面倾尽了心血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由于它所涉及到的方面太多，用个人的力量很难把这个问题做出突破性的解决，大家都感到这个题极困难，做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少。后来又有人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

来，要让学术界联合起来做，这个人就是前国务委员、国家科委主任宋健。1993年他应邀到埃及访问，参观了埃及的国家博物馆。埃及国家博物馆之大家都知道埃及的文化非常灿烂，在博物馆里面，他感到非常震撼，就是看了这个展览以后，他感到对这个国家整个的看法都改变了，尤其是它里面有一张年表，就是埃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六千多年，哪个王多少年，哪个王多少年，非常清楚，这张年表使他感到非常地震惊。回国以后，宋健同志就开始找我们国内编写的历史书看，他曾经找了教育部组织编



埃及国家博物馆

写的几种中国历史、世界历史的教材来看，就发现我们所有的书都是从夏开始的，在我们书后面，附录里的年表中，五帝是不写的，都是从夏开始。从夏开始各个书也不一样，打开第一本一看，约公元前21世纪，夏在黄河流域开始活动；再翻开一本，约公元前22世纪，黄河流域出现夏朝；再翻开一本，约公元前20世纪，夏朝开始在黄河流域出现。大家想想看，三个世纪过去了，只是一个朝代，我们国家自己的学者，对我们本民族文化的年代看法，可以相差几个世纪，这使他感到非常地吃惊，这反映了我们对中华民族起源这个问题，学术界缺乏一致的共识。尽管我们都说，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，实际上这里面有许多非常含糊的看法。在国外许多大的工具书的后面，都有很多附表，其中有的附表就是世界诸古文明对照的一个表，这个表一打开，第一篇就是埃及，接着就是两河流域、印度等等，我们中国全是空的，要翻好几篇以后才开始出现约多少世纪黄河流域有夏。所以前一些年，剑桥写剑桥中国史，第一卷是秦汉史，人家说你们自己都弄不清楚，你们自己先弄清

楚再说。这些年看法好像有所改变，先秦卷现在好像也写出来了，但是总之从我们自身来说，大家感到这是一个问题。当时宋健同志就觉得，对于夏朝是从哪一年开始，我们竟然可以有三百年的分歧，一个朝代都过去了，这个时候他就提出来要找一些学者、专家来座谈，究竟什么原因，我们这个年代问题解决不了，如果解决的话应该怎么办。这个会里面大家都谈到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它涉及到考古学的问题，涉及到考古文物测年的问题，涉及到天文学的问题，涉及到古文字学的问题，涉及到文献学的问题等等等等，我们每一个学者个人的力量，都很难穷尽这么多门类的知识，此其一；而且要进行这种研究，需要大量的经费，而现在文科的经费，众所周知是非常有限的，要用非常有限的经费，去解决这么一个困难，就是争论几千年，都解决不了问题。宋健对这件事情表现了极大的热情，他一方面找国内的这些专家座谈了解，另一方面给其他海内外的许许多多专家写信，比方说在美国的张光直，这是一个美籍华人，他研究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和古代文明，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学者，另外像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谷诚等等，他分别给他们写信，说现在我想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这许多学科的专家组织起来攻关，来解决夏、商、西周的年代问题，你觉得这样做可行不可行。这些信发出去以后得到了非常热烈的回应。有很多学者就表示，你比方说杨向奎先生，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学者，他就表示，这个问题将来即使做不出来，也值得做，因为这个题目太重要了，我们一次做不成，下个世纪还可以接着做，但是决不能不做。后来宋健在国务院召开一个国务委员会议，当时就把国家科委、中国科学院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国家文物局、国家教委、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、中

国科协等七个部门的领导全部请来了，跟他们商量，说现在有一件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应该做，我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，今天想征求诸位的意见，看看应该不应该做。结果没想到得到了与会的七位部领导的一致支持，后来做了一个决定，就是要启动一个叫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的项目，由七个部委的领导组成一个领导小组，这个领导小组的任务是给这个科研起保证作用。什么叫保证作用呢？就是你没有经费我给你找经费，当时在会上就定了，你们这个部给多少？我愿意给两百万；你们这个部愿意给三百万；我们实力差一点，我给一百万……一凑当时就凑了大概一千三百万。如果说这个项目进展到一定的时候经费有困难，这个领导小组就负责给大家在经费上解决。另一个方面，这个项目在启动以后，它要涉及到许多部门，任何一个个人都很难有力量到别的单位去借人，我要去北京大学借调一个人到清华大学来工作，我没有这个力量，那么在需要协调的时候，这个领导小组它就起作用。我们在后面还要讲到，比方说要动用一些文物，有的地方它不愿意拿出来，这个时候领导小组让七个部委联合下文，这件东西你应该拿出来供研究用等等。

整个项目在业务方面是由一个专家组领导的，专家组由 21 个学者组成，这 21 个学者分别来自考古学、天文学、测年技术学、历史学等学科。为了在发生冲突的时候，要有人出来最后裁决，这个项目采用了自然科学的一些做法，就是建立首席科学家的制度。首席科学家由四个领域的著名的专家组成，一个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教授，一个是北京大学前文博学院院长、著名的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，第三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仇士华先生，第四位是中

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著名的天文史学家席泽宗院士。随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提出了一个实施的方案，这个方案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里面进行了论证，项目组之外还邀请了许多的专家来进行论证，我们这个课题的设置是否合理，是否可行，我们的目标是不是合理，我们的技术路线是不是科学。最后专家通过了可行性的论证报告。在这个基础上，1996年5月16日，我们在中南海正式宣布启动这个项目，由宋健和李铁映两位领导给专家组的成员颁发了聘书，同时正式地向国内外宣布。

第二个问题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要达到什么目标，这么多钱投下去主要要做什么。这个目标分成四段，一段是西周共和元年，也就是公元前841年以前，包括西周的早期、中期和晚期前半部分这十个王，这十个王要给出比较准确的年代；第二段是商代的后期，如果说我们将盘庚迁殷作为一个标志，把商代分成前期、后期，那么盘庚迁殷以后，一直到商朝灭亡，我们把它叫做商的后期，对这个时期，我们要给出比较准确的年代，它这个后面有八世十二个王，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出比较准确的年代；第三段是商代的前期，商代前期我们提出了要给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，这个就跟前面有不同了，每一个王都给我们给不出来，我们只能做到在前半段里面先给出一个范围，在这个范围里面，我们能找到几个点，那么这个框架它里面不是空的，是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；最后一段是夏代，夏代定得比较松，就是给出一个基本的年代框架，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就可以了。用宋健的话来说，就是我们不要一会儿说是22世纪，一会儿21世纪，一会儿20世纪，我们就是要给它一个确切的说法，这个框框到什么地方。



盘庚迁殷

第三个部分我主要想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，这个年代是怎么研究出来的。我们一开始做夏商周断代工程，首先涉及到一个技术路线问题，是先做夏，还是先做商，还是先做周呢？当时我们经过研究决定，一开始先做西周这一部分。因为在公元前 841 年没有分歧，那么公元前 841 年，就是说共和元年，到武王克商这中间，这十个王我们要尽可能地找出若干个定点，这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武王克商。关于武王克商，我们到现在为止有 44 种说法，最早的说是公元前 1130 年，最晚的说是公元前 1018 年，这样就差了将近 110 年左右，相差一个世纪，就是说武王克商在哪一年代点，从公元前 841 年往前它有一个摆动，这个摆动它摆动了一百多年，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定点把它卡住，它还会摆动，所以一定要在前面找出一个年代点，使它没法再摆动，那么我们后面其他王的年代里，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，我们再来排定十个王，应该是怎么排法，你把这个点找出来了，商和周的分界就找到了，找到了以后我们可以排这十个王。另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古书记载来推，就是盘庚迁殷到武王克商，这个年代怎么确定，说老实话，两千多年来，学者要寻找、要解决这个三代的年代问题，用力最多的就在武王克商，所以我们曾经说，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，相当于哥德巴赫猜想。我们前面找不到一个东西，能使它不摆，或者说让它偏摆得小一点，不要一百多年，偏摆二十年行不行？然后我们把这个范围定下来以后，我们再进一步把它确定详细的年代。那么第一步，就是让它偏摆的范围缩



周武王姬发

小，不要一百多年，我们短一点行不行，这里面当然就开始了多学科探索。第一个我们是找考古学，因为考古学应该清楚的，商朝盘庚迁殷以后，在今天河南的安阳就是殷的都城，它在这个地方呆了 273 年，古书上记载的，没有再迁过，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找到了它的宫殿的遗址，生活的遗址，遗存非常地多，而且我们考古发掘得到的资料非常多，它是灭亡的。我们有没有可能就在这个地方找到它年代最晚的含炭的标本。在这里简单说一下，现在我们考古上测年，有一个叫碳 14 的方法，就是在大气里面，有一种碳同位素叫碳 14，碳 14 我们动物、植物体内都有，因为你要呼吸要吃东西，树也要吐故纳新，那么碳 14 就不停地被吸入进去，我们人类要呼吸，所以也吸进来了，那么人体内的骨头里面，碳 14 的含量是一个恒定的数字，一旦这个生物死亡了，比方说这棵树被砍了，它不能跟大气进行交换了，那么它碳 14 的交换就停止了，人如果死了他不能呼吸了，这个碳 14 也就停止了。现在国际上研究碳 14 还有一个规律，每隔多少年以后，它里面会减掉一半，那么再过多少年它又剩一半，再过多少年它又剩一半，这个叫半衰期，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，把这个含碳的标本拿来，我们测定它里面还剩多少碳 14，那么就回推他什么时候死的；还有一种叫 AMS 法，它是叫重离子加速器，来找它的含量，这是一种更先进的方法。我们以前做一个碳 14 的年代需要什么呢？一般来说大概需要一公斤以上的炭样，摆在里面去做，大概需要二十个小时。那么有些数据我们就没法做了，假如那个木渣到最后炭没有一公斤了，只有二百克了，这个量不够，它就做不出来，而这种重离子加速器实



殷墟宫殿遗址

验，它用这种方法做出来，它只要一克，而且做一个数据大概只要一两个小时，而且它的精度会比较高，我们就有可能在商代的最晚的这个墓葬里面，我们挑选比较典型的炭样，然后做碳 14 测年，给出一个年代，这样就知道一个参数，尽管它有些误差，但是它有一个参数，大概这个偏摆就不会太大了，要比我们原来的一百多年，肯定要大大地缩小。另外我们要找些周初的墓葬，西周初年的墓葬，我们对它进行碳 14 测年，那么我们就看这两个碳 14 的年代是不是接近，如果这两个数字是接近的，那么我们至少可以给一个判断，一百多年的偏摆当中，比较正确的那个结论是偏长还是偏短，对不对？我们一个做了殷墟，另外做了北京房山的琉璃河。据史书记载，武王克商以后，武王和成王当时曾经打下一片地方就封一个诸侯，史书上记载封召公于北燕，我们叫燕京，这个“燕”最早就从这里来的。燕在什么地方？以前不知道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邹衡先生在一个废品收购站里发现一件铜器，这个铜器使他敏感地意识到，出这个铜器的地方，有可能是最早的燕国的都城，后来他经过了很艰辛的努力去调查，最后发现就在房山琉璃河。在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发现数以百计的墓葬居址，其中有一个编号叫做 1193 号墓的，这个墓非常特殊，它有四个墓道，这四个墓道是在四个角上，这个里面出土了一些铜器，铜器上都写着燕国的诸侯，燕侯的铭文很长，据我们分析，和史书上的记载是一致的。经过对这个铭文和史料的分析，确认这个墓就是燕国第一代诸侯的墓葬，它有很典型的意义，所以我们就对这个墓葬的炭样



有四个墓道的墓葬

进行了测年，这样我们又得到了一个数据，这个数据它是跟殷墟的数据能够参照、能够比较、能够匹配的。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山西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这些年我们在西周考古里面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，这个发现就是邹衡先生发现的，我觉得了不起的考古学家，他能凭着自己的学识，凭着自己的经验，从地下把遗址发现出来。邹衡先生他具有这种能力，最早的晋都在什么地方呢，已经没人知道了，所以到了《汉书》里面，《地理志》里已经不知道了，最早封唐叔虞这个地方在哪里，已经不知道了，有学者推测这个地方可能是在太原，因为那个地方有晋水，这个意见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，所以我们今天到太原晋祠，大家认为这个晋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祥的，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。邹先生在考古学上有许多重大的发现，其中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他决心要把早期晋都给找出来。邹先生到山西调查，他首先找到太原，他是一个非常严肃、非常勤奋的考古学家，据说到一个地方去参观，他的学生看到一堆陶片去摸，摸了可能十分钟、二十分钟，就站起来拍拍手走了，但是他能够蹲在那里，一蹲蹲两个小时，不厌其烦地、一片一片地摸，所以他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。他到了太原附近，就把当地博物馆里考古队发掘的陶片进行了非常仔细的研究，最后发现它基本上是春秋以后的，而且是北方内蒙古那个方向过来的文化因素居多，这里面你看不出这种文化是从周镐京那边过来的文化，看不出来。假如说它是最早的晋都，那么一定有大量的陶片有周初的特点，可是找不到，于是他就放弃了，来到山西的南部。大家想想看，山西南部多少个县，多少个村，要在里面把早期的晋都找出来，谈何容易，但是他



山西太原晋祠